

关于唐代敦煌教授《文选》的一点臆测

丁红旗

(华东师范大学 古籍研究所, 上海 200241)

内容摘要:通过讳字,能大致推断天津艺术博物馆、日本永青文库藏敦煌写本《文选注》写于唐德宗时代。在性质上,这两个写卷属于讲章的记录。其内容能让我们看出敦煌一地讲学《文选》的一些情形,特别是其与当下科举的密切关系;或者说,这种讲解是唐代科举下《文选》兴盛的产物。这也足以证明讲章与科举的某种近属关系。

关键词:写卷时代;性质;讲授情形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0-4106(2011)01-0061-06

A derivable education situation of teaching WENXUAN in Dunhuang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DING Hongqi

(The Chinese Classics Institute of Huadong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Abstract: By certain characters used for avoiding mentioning the name of emperor of the Tang Dynasty, we could dating the copying of WENXUAN from the reign of Dezong (780-804A.D.)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housed in the art museum of Tianjin and Eisei Bunko Japan. By study the nature of two scrolls we tell that they were notes of teaching WENXUAN. The textual research let us know how WENXUAN used a text book be educated in Dunhuang, especially for they close relation with imperial examination, for other words, public teaching of WENXUAN was the result of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Keywords: Two Scroll of Dunhuang Manuscript; Date; The Nature of the Texts; Education Situation

唐·张鷟《朝野僉载》云:“唐国子监助教张简,河南缙氏人也,曾为乡学讲《文选》。^[1]”而据《四库提要》的推断,其书撰写的年代“在天宝之前”,“凡滥入中唐后事者,皆应补遗之文”;那么,判断这一

情形为开元、天宝时事,就或无大谬;但张简如何讲授《文选》,因记载的简略,且又夹杂、附益在不无神秘的野狐化形的故事中,而不能得知。幸运的是,在西北敦煌一地,因留存有三个关涉讲章的

收稿日期:2009-11-10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资助项目“五臣注《文选》研究”(20090450677)

作者简介:丁红旗(1973—),男,河南省信阳市人,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师。

《文选注》抄本,而能让我们窥知一二。

一 写本年代的推断

这三个关涉讲章性质的《文选注》,指俄藏Φ·242(先前编号为L.1452,下简称俄藏本)、天津艺术博物馆(下简称天艺本)和日本永青文库所藏(下简称永青本)《文选注》。俄藏的抄写时间已有学者探讨,概括而言,傅刚先生据文中“世”、“民”字缺笔,“治”、“照”、“隆”、“基”不讳,认为写于太宗朝。对此,范志新先生与许云和先生不同意,范文博列其讳字,认为避至代宗,而定在“代宗至顺宗三代,大而言之,盖在中唐也。”许文则据朱彝尊《经义考》卷288中据文宗开成二年(837)国子监刻成的《石壁九经》总结的讳字规律,以及“古者卒哭乃讳,故生不讳”的礼制,定为肃宗之后代宗李豫时的抄本。

今按,假如通览饶宗颐《敦煌吐鲁番本〈文选〉》(中华书局,2000年)所收的卷子,就会发现,俄藏无论就形制(行大字十三、十四字不等;注双行,行十九、二十字不等)还是抄写工整的程度,都堪为赞叹。重要的是其避讳较为严格,这也是能通过讳字来探讨抄写时代的关键所在。毫无疑问,唐时的避讳有一个从宽松到严格的前后发展过程。如果我们把有明确抄写年代的永隆二年(681)弘济寺抄本,即P.2528卷子与俄藏相比,无疑能发现敦煌写卷的一些避讳特点。P.2528卷子中,“若历世而长存”中“世”字不避,而“今民馁而君逞欲”中“民”字缺末笔,就说明其时避讳并不严格;还能说明的是,其写卷遵守“卒哭乃讳”的礼制,因为卷中“赞芳永逸,无为而治”的“治”,并不避今上李治的御名(681年,李治已在位31年,敦煌不存在不知道或传不到的问题)。但这一早期避讳不甚严格的情况,到了后来就严格多了,俄藏Φ·242写卷的出现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至少此卷中不仅“世”、“民”字都避,而且避类似的字,如“临组乍不继”中“继”字也避——这只能是严格避讳下产物。所以,以互相比核、参照的观点来理解,就可能更贴近事实。通过核对(相关的字用繁体),“丘渊之《新集录》”、“皆出《白虎通》”、“救鲁民”、“康世屯”、“临组乍不继”、“享国渐世”、“嫚被顯祖”、“但学即得”、“彪之以文”中“渊”、“虎”、“世”、“民”、“顯”、“但”、“彪”等字避,而“隆斯民”、“靡適不怀”、“豫章之木出

焉”中的“隆”、“适”、“豫”不避;则俄藏当为代宗李豫时的抄本。

下面看天艺本、永青本的避讳情况:“欲龙虎之为志”、“遣夏侯渊”、“世行”、“见为城旦”、“赵有毛亨《诗》”、“太守从事,適辽东”中的“虎”、“渊”、“世”、“旦”、“亨”、“適”等字避;而“元元,善民也”、“禹初治水时”、“故言檄豫”、“不誦:不肯习誦”中的“民”、“治”、“豫”、“誦”字不讳。又,天子七庙,避讳有出祧制度;据此,大致为顺宗时代的抄本。当然,这里还要考虑一下敦煌当时的政治情况。敦煌在建中二年(781)陷蕃,大中二年(848)当地大族张议潮起义赶走了吐蕃,其间近70年是在吐蕃直接管辖下的;而避讳无疑牵涉到对政权的认可、归属感和立身、节操等大事。所以,781年以后的写卷,再据唐讳去推断抄写的年代,就不免有些问题。这样前推,定在德宗时的抄本,即陷蕃以前,大致还是可以说明问题的。不过,因大唐情结的存在,其民间避讳也可能持续更长一些时间,因为陷蕃期间,这一地的民众几乎一直进行着不屈的反抗^[2]。但《唐摭言》卷1《会昌五年(845)举格节文》中,没有沙州的贡举名额,也说明了这一问题的复杂。

二 写卷的性质

对Φ·242《文选注》,许云和先生从六个方面,即基本上用口语、不避重复、引文不规范、详略不当、多以己语转述典故、自己作的注仅十之一二,而论定注本为“乡塾选学讲章之本”,“残卷实实在在就是一个学生记录的乡塾选学讲章之本”。许氏所言的“选学讲章之本”,确有道理,可为定论;但其说的“学生记录的”、“乡塾”两个方面却不免略有争议。从卷子本身看,此卷抄写清晰、工整、整洁,一般的听课笔记恐怕做不到,至少会有因紧张或其他原因而漏掉的地方,这一点如与天艺、永青

① 罗国威师《俄藏敦煌写本Φ242号〈文选注〉的文献价值》,《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2期。傅刚《俄藏敦煌写本Φ242号〈文选注〉发覆》,《文学遗产》2000年第4期。范志新《俄藏敦煌写本Φ242号〈文选注〉与李善五臣陆善经诸家注的关系》,《敦煌研究》2003年第4期。许云和《俄藏敦煌写本Φ242号〈文选注〉残卷考辨》,《汉魏六朝文学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② 此据罗国威师《敦煌本〈文选注〉笺证》前所附的影印件,巴蜀书社,2000年5月。

抄本比较,能更清楚地看出(这两个抄本漏掉了好多内容)。因此,与其说是“学生记录”的抄本,还不如说是老师讲学的底本,倒可能更近于事实。其所说的“乡塾”,在没有证据前,恐怕也不能这样断言;因为敦煌一地的教育比较复杂,既有官学性质的州学、县学,还有私学性质的义学、家学、寺学^[3],这样笼统说“乡塾”恐怕未必妥当,也可能给人不必要的误解。

与许氏的推断相类似,天艺、永青抄本也存在上述情况。整个说来有以下五点:

1. 注本多用口语,这与严格意义上的注本有根本区别的。如称南齐为“齐家”,称周为“姬家”,称北魏为“胡元家”等,并且不避方言,如“李斯教始皇”,“渠得之者,未解其义,但传教使读”等。其最常用的句式为“谓……”,“言……”,或“故云……”、“云……”等,如“召人者,是言入谷来召之人”,“萌芽,言始初有也”,“三事,谓《尚书》、《逸礼》、《左氏春秋》”等,比比皆是。

2. 与一般的释义或注典不同,抄本多节略原文语词,着眼于疏通、串释文意,表现出较浓的讲授色彩。如:“‘至若兰芷’、‘桂林’等,自喻北胡虏之地,非我贤士所处。”“‘腾,阍人无儿,故《曹瞒传》曰:‘腾是得夏侯谭子,即嵩’,故云‘乞句’。”“‘专行’、‘卑侮’等,道操执天子权。”再如释“卫使者不然”,“‘不然’者,畏有非常云,故‘卫’之。”显然,注者意在提醒所讲的语词、句意。另外,引事时多以“事出……”、“出……”为体例,也是告知的口吻;这种体例几乎贯穿了写卷的始终。

3. 整个看,写卷缺释的地方较多,据韩国奎章阁本《文选》原文,缺释10几字、20多字是常态,缺30字以上,甚至高达90字、180多字的,也在多有,如《与嵇茂齐书》中“仰荫游凤之林”、“无金玉尔音”间缺释原文102字,《喻巴蜀檄》中“处列东第”、“重烦百姓”间缺释原文189字,《檄吴将校部曲文》中“邑侯杜瓌”、“焚首金城”间则缺释原文125字;这在注释体例上是一个严重的不可忽视的缺陷。比较之下,Φ·242写卷的正文则无一残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笔者推测,如排除漏页、脱页的可能,那就只剩一种情况,即学生在听讲时因某种原因漏记造成的。毫无疑问,这当是一个学生的听课记录。这一点只要与Φ·242《文选注》比较后就能发现,在格式、空格、分段、工整等方面,俄藏与规范的刻本毫无二致,如类,顶格,一行;标

题,另起一行,顶格;次一行,正文。而天艺、永青都不单独起行,一连下来;至于空格,更随心所欲,毫无规律,有时甚至在一个词语解释的中间,也没缘由地空了一格;这种不无杂乱的情形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课堂记录的性质,而非规范的抄写本。

4. 简繁失当,不该注的注了,该注的却反而不注,如《北山移文》中的题解,重复“当是丹阳为都”、“齐时都丹阳”;在解释“钟山之英,草堂之灵,驰烟驿路,勒移山庭”时,语意反倒因繁琐而滞涩。而且大量的还是较浅显的词义解释。如“李叟,老子”;“根萌,言未树根芽于土地,言不可”;“恙,病也”等。

5. 经核查,注本引用的出处、故实,多与原典不合;且有随意以口语来概述内容的倾向,这就不能用一时的疏忽来解释——此当然不合注文的规范,而只能是讲章下的产物。

特别说明的是,写卷错误极多,如不校释,几乎不能卒读;这一点更与Φ·242《文选注》判然有别——这也只能是听课下的产物。综合而论,此写卷当是学生的课堂笔记,而非老师讲课的底本。

三 写本与当下科举的关系

既然是讲章的性质,那就有一种现象,其着重提及的书名、引文或详加解释的必然是其熟习的内容;这也容易理解,大凡一己熟习的知识,总会不由自主地会多讲一些。因此,从其引文、书名能看出其擅长的知识或背景。统计引文中出现的书名后能发现:天艺写本共20条,其中《易》4条,《诗经》、《尚书》、《老子》、《左传》、《庄子》各1条,计9条,近于一半;永青写本共16条,其中《易》6条,《诗经》3条,《礼记》2条,《尚书》、《春秋》、《周礼》各1条,计14条,近十分之九。其详加解释的内容,10篇文章中,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缺注的地方最少;其解释最详的地方有两处:一是“欲建立《左氏春秋》……不肯置对”等43字,讲者竟解释了151字,对当日经学《左氏春秋》的存亡、废兴,确实称得上

奎章阁本《文选》,其底本为北宋哲宗元祐九年(1094)秀州州学本《文选》,基本上没有删节,保留了李善注、五臣注的原貌。

天艺本是“十纸,……每纸二十二行”,永青本是“十一纸连成长卷”,其漏页、脱页的可能性不大。

了如指掌。一是对《檄蜀文》“未遑修九伐之征”中“九伐”的解释,讲者不仅说出“九伐”的具体内容,还进一步概述其意旨,以致共用了115字,可谓洋洋洒洒。这足以说明讲者对经学的浸染和熟习,已浸入到骨髓了。更宽泛一些,我们也能发现,讲者详加解释的内容,又多是《史记》、《汉书》、《三国志》,这固然与标题的限制有关,如陈琳《为袁绍檄豫州》,但其对史书的熟习也应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种读习经书中融汇《文选》,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必然。据敦煌本《杂抄》载:

《史记》(司马迁修)、《三国志》(陈寿修)、《春秋》(孔子修、杜预注)、《老子》(河上注)、《三礼》(孔子修、郑玄注)、《周礼》(王弼注)、《离骚经》(屈原注)、《流(刘)子》(刘协注)、《尔雅》(郭璞注)、《文场秀》(孟宪子作)、《庄子》(郭象注)、《切韵》(六(陆)法言作)、《毛诗》、《孝经》、《论语》(孔子作、郑玄注)、《急就章》(史犹(游)撰)、《文选》(梁昭明太子召天下才子相共撰谓之《文选》)、《汉书》(班固撰修)、《典言》(李德林撰之)、《千字文》(钟繇撰、李邕注、周兴嗣次韵)

上述诸经史可视为敦煌在中晚唐时期的基本教材;其教育过程,是先识字、习书,次习启蒙教材,然后在官学(州学、县学)学习儒家经典。需说明的是,不仅明经要习经书,进士也需帖经,只不过“帖”的内容前后有变更;大体说来,初唐帖一小经并注,开元二十五年(737)后,帖一大经及《老子》(见《唐六典·尚书礼部》)。因此,不管是明经、进士,经学都是必学的,只不过要求不同罢了。但也显然,仅读这些书是不行的,或不易消化,这就需要辅助以必要的其他书籍。此种要广泛读习经史的言论,在敦煌卷子中并不乏见,如翟奉达的七言诗,“男儿不学读诗赋,恰似肥菜根尽枯。”(《齿牙》(出可)书)(括号里是一个字)“男儿不学读书,恰似园中肥地草。”S·2048写卷《父母恩重讲经文(一)》说的更为具体:“人家男女,从小至大须交(教)礼仪。是男七岁十岁以来便交(教)入学……囑仙(先)生交(教)文字,孝养礼仪须具备,未待教招一二年,等闲读尽诸书史。”在上述书目中,《文选》列在其间,正说明是士子在科举前所要阅读的书籍之一。反过来,我们在敦煌写卷《新集文词九

经抄》中也能找到例证,即《经抄》中引用《文选》。据郑阿财《敦煌写卷新集文词九经抄研究》,P·2557、P·2598、P·3621“正可拼凑缀合成一具有首题、尾题,且内容完整的《新集文词九经抄》一卷并序。”

[4]统计后,郑氏论断:

综观《新集文词九经抄》所援引之书,以数量而言,经部书籍出现之次数,几占全书之半,其次则为老、庄等道家典籍。其中,《论语》几占四分之一(79则),《尚书》十分之一(33则),《老子》(含河上公注)约十分之一(34则),其次为《太公家教》(26则)、《礼记》(25则)、《庄子》(20则)、《诗》(13则)、《易》(12则)、《孝经》(10则)、《史记》(12则),其援引的情形与唐代教育的实际情况相吻合。 [4]30 (则数为笔者据其统计数目所加)

出自《文选》的条目,据笔者统计,共7则。固然《文选》并不以通俗性的格言、嘉语著称,但其能有7则入列,比较起《易》、《史记》,却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这确实说明了《文选》与读习经书、科举的密切关系。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据《唐摭言》卷1《乡贡》载:

有唐贞元(785—804)已前,两监之外,亦颇重郡府学生,然其时亦由乡里所升,直补监生而已。尔后膏粱之族,率以学校为鄙事。若乡贡,盖假名就贡而已。景云(710—711)之前,乡贡岁二三千人,盖用古之乡贡也。咸亨五年(674),七世伯祖鸾台凤阁龙石白水公,时任考功员外郎,下覆试十一人,内张守贞一人乡贡。开耀二年(682),刘思元下五十一人,

虽有时可“以诗赎帖”,但机会不多。

为以下七条:1.“长卿曰:‘盖闻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所忽者也。’”(《上书谏猎》)2.“屈原《离骚经》云:‘积毁销金,积谗磨骨。’”(按:应为江淹《诣建平王上书》)3.“班固《西都赋》‘风毛雨血,洒野蔽天。’”4.“《西京赋》‘税繁役劳,人尽力殫。’”(按:《西京赋》中只有“赋政任役,常畏人力之尽也。取之以道,用之以时。”)5.“潘安仁《笙歌赋》‘闻之者悲,听之者呜咽。’”(按:祢衡《鹦鹉赋》:“闻之者悲伤,见之者陨泪。”)6.“赋云:‘轻生重气,结党连群。’”(张衡《西京赋》:“轻死重气,结党连群。”)7.“赋云:‘笔不停缀,文不加点。’”(按:此祢衡《鹦鹉赋》中的句子)

内雍思泰一人。永淳二年(683),刘廷奇下五十五人,内元求仁一人。光宅元年(684)闰七月二十四日,刘廷奇重试下十六人,内康庭芝一人。长安四年(704),崔湜下四十一人,李温玉称苏州乡贡。景龙元年(707),李钦让称定州乡贡附学。尔来乡贡渐广,率多寄应者,故不甄别,置于榜中。

从间隔年数的缩短看,咸亨五年到景龙元年30年间,乡贡(即地方未经正规官学教育而由地方官选送,或怀牒自荐的考生)在迅速发展;发展的结果就是榜中不再特意标明。这种由乡贡构成的对官学的强烈冲击,发展到德宗,甚至出现了始料不及的情形——贞元十四年,进士“殆绝于两监”^[5]。这一点,从《会昌五年举格节文》中更能清楚地看出两监的衰落和乡贡的膨胀。而天艺、永青本写卷正出现在这乡贡日渐兴盛的时期,即上所推断的德宗时期;可以想见,地方私学的兴盛也势在必。为提高竞争力,除经学外,或者说为了捷径,为能提高诗赋的水准而读习《文选》也自在情理之中。《文选》进入了私学教授的视野。这三个敦煌写卷正好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明。而敦煌之所以能出土了一批《文选》的写卷(共29个写本),大约原因正在于此。

四 写本讲章的特色

既然写本在盛行的李善、五臣注后,那么三者是怎样的关系呢?或者说,虽然属于讲章的性质,固不指望其流传后世,但从便宜的角度说,是否会借鉴声名甚盛的李善、五臣注呢?

罗国威师《敦煌本〈文选注〉笺证·前言》曾引日本汉学家神田喜一郎对永青本的《解说》:

此注,与李善注、五臣注全然不同。我国平安时代荟萃《文选》诸注而纂辑的《文选集注》一书之现存残本中,正好有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一文存在,以与此敦煌本注相较,竟无一条相同者……(天艺本)与李善注、五臣注、日本平安朝写本集注等均有不同。

即这两个写本都没有借鉴李善、五臣注。如果把这两个写本与现存较完整的韩国奎章阁刻本《文选》比较,能发现两者所述,确系事实。为说明

这一点,兹以解说较细的“檄”类解题为例说明:

永青本:

“檄”,皦也,明也。将欲出师,比之于雷,雷动则电出,故师先之以皦,比电光出。言皦然以道理喻告之。六国时,(张仪)游于楚,至楚相处,相失璧,而怨秦盗之。故仪,秦昭王时,为秦相,为一尺二寸,檄楚相。言其皦可明。檄,自张仪始。当汉武帝建元五年,知通夜郎、滇池,遣中郎将唐蒙,赍帛遣诏,征巴蜀千人,兵粮送运。蒙,在郡发万人,后诛巴蜀之渠帅,蜀人大惊,故帝遣司马相如,相如往檄,以晓喻之。

李善注:

《汉书》曰: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犍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军兴法诛其渠率。巴蜀人大惊恐。上闻之,乃遣相如责唐蒙等,因谕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

翰曰:

檄,皎也,喻彼使皎然知我情也。此周末时,穆王令祭公谋甫为威让之词,以责狄人之情,此檄之始也。唐蒙通夜郎,征发巴蜀吏卒,因军兴法,诛其渠帅,巴蜀大惊。上闻之,使相如作此檄以责唐蒙,因喻巴蜀人以非上本意之事也。

比较后能看出:永青本对“檄”的解释,本于《文心雕龙·檄移》(这点与李周翰不同,李周翰把“檄”的起源追溯到周穆王);对“喻巴蜀檄”的解释,则本于《汉书》,因为其较具体地概述了前后经过(这点与李善不同,李注可能限于引述的体例,而只节选其关键的章节作注,部分内容未说)。这就足以说明写本并非依据李善、五臣注,而是史书。这也有一个铁证,即抄本在解释《与嵇茂齐书》“昔李叟入秦,及关而叹”时说“叹事未详”,“是为敦煌本注著者未曾见李善之明证也”^[6]。(对此,李善、五臣都有注。)这就不免让人疑惑:因为至少早在永隆二年(681)就已有相当完整的大赋《西京赋》李善注的抄本,假如讲授者想获得李善注、或五臣注,应当难度不大——但为什么不借鉴呢?笔者推测,就整个注释看,作者对文意的疏通、串释相当熟练,是这种熟练和自信让他没去借鉴;或者说,偶有借鉴,也淹没在自己的解释中而让后人无

从分辨了。但不管怎样,由这两个写卷,对当日讲授《文选》的情形,却可推知一二:

第一,疏通文意:这种情况大量存在,触手可及,大略有三种:其一纯粹的文意翻译:如“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的注为:“各写廿通,藏之于秘阁,伏隐藏陈”。其二概述一句或几句的文意:如“或先贞而后黜”的注为“先贞后黜,谓被召入尘俗”。“曩者强秦弱主,赵高执柄,专制朝权,威福由己,时人迫胁,莫敢正言,终有望夷之败”的注为“此言比曹操执权,假卫天子,如赵高、禄、产等”。其三解释其间隐含的故实:如“续遇董卓侵官暴国”的注为“‘续董卓’者,袁绍当为虎贲中郎将,遭董卓起,乃是向关东,袭陈馥军,取之,遂令聚关东起义军,欲诛卓。徐、兖、青、冀、豫四州,合谋推绍为盟主,辞合兖州,俾坠其师”。

第二,解释字词:这种情况更为习见,仅举两例:“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的注为“汉时,以赃买得官,故云‘舆金’、‘输货’也”。“操,赘阉遗丑”的注为“‘赘’,赘肉,言操本乞养之子。后‘阉’即腾,是黄门儿”。

据此,讲授者释义的意图一望即知,而非是李善般注明故实。这是唐代科举考试方式的必然结果。开元、天宝以来,明经考帖经、策试,进士考帖经、杂文、策试(名称相同,但各自要求不同)。而帖经,主要是背诵,为便宜计,根本不必深究典章故实。所以,永隆二年(681)(时距唐开国已63年)就以诏令的形式驳斥投机取巧者,“如闻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进士不寻史籍,惟诵文策”。这还只是初期的情形,尚不甚严重。开元二十五年(737)的诏令,措辞就严重多了:“进士以声律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7]对此,采取“仍按问大义十条”——即考问意旨的方式来解决,以防范于未然(一个“仍”字,说明先前已实行过)。这一做法也在官学中得到了执行,太和五年(831)“明经帖经,口试,策经义”^{[7][3]}

这也有一个证据。法藏P.2527扬雄《解嘲》,就脱落了李善注十处,这很可能就是抄写者认为不必要而省略的;因为这十处,只能提供语源,实在无补于文意的理解,如“吾闻上世之士,人纲人纪,不生则已”,善注:“《尚书》曰:‘先王肇修人纪。’孔安国曰:‘修为人纲纪也。’”“纁青拖紫,朱丹其毂”,善注:“《东观汉记》曰:‘印绶,汉制,公侯紫绶,九卿青绶。’《汉书》曰:‘吏二千石朱两轡。’”

“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苍天,大者含元气,细者入无间”,善注:“《春秋命历序》曰:‘元气正,则天地八卦孳。无间,言至微也。’《淮南子》曰:‘出入无间。’”而这个写卷,据其间的讳字,“虎至则靡耳”、“闻上世之士”、“旦握权则为卿相”、“世治则庸夫高枕”中的“虎”、“世”、“旦”、“治”都避,则至少是睿宗李旦以后玄宗时期的写卷,正好与天艺、永青本处于同一个时期。这样,结合时代风尚,这种省略就不足为奇了。又,欧阳詹在《太学张博士讲〈礼记〉记》时说其贞元十四年(798)张博士讲解《礼记》时,“先申有礼之本,次陈用礼之要,正三代损益得失,定百家疏义长短,铨乎作者之意,注乎学者之耳,河倾于悬,风落于天,清冷洒荡,幽远无泥,所昧镜彻于灵台,所疑冰释于心泉。”这当然是好的情况;而景云三年(712),皇太子行释奠礼时就极不客气地批评当时国学的讲授方式:“问《礼》言《诗》,惟以篇章为主;浮词广说,多以嘲谑为能。”^[8]据此,我们似乎能说,讲解篇章、疏通文意正是当日的一种主要方式。

不管怎样,至少能这样说,不论这两个写本是否参考了李善、五臣注,但其疏通文意、解释字词的做法,却无疑与五臣注一脉相承。这也能从具体的注本上说明《文选》盛行时期的讲读风貌,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五臣注解方式的盛行。

参考文献:

- [1]张鷟.朝野僉载[M].北京:中华书局,1979:167.
- [2]刘进宝.敦煌学通论[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35-91.
- [3]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C]//历代教育制度考·隋唐五代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608-626.
- [4]郑阿财.敦煌写卷新集文词九经抄研究[M].台湾:文史出版社,1989:19.
- [5]王定保.唐摭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5.
- [6]罗国威.敦煌本《文选注》笺证[M].成都:巴蜀书社,2000:6.
- [7]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631.
- [8]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185.